

# 二重证据法与先秦诗乐学研究举隅

徐正英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上博简《孔子诗论》分别以“不可不畏”“其绝”肯定被宋儒列为“淫诗”的“郑风”《将仲子》和《褰裳》两诗,坐实了传世文献《论语》中孔子对全部《诗经》作品所作“思无邪”的肯定性评价,说明其“放郑声”应该不包括郑国诗歌。《孔子诗论》中孔子提出“诗亡隐志(诗言志),乐亡隐情(乐抒情),文亡隐意(文表意)”系统文艺本质论,与传世文献《诗经》“作诗言志”观念、《左传》“(赋)诗以言志”说法相印证,说明《尚书·尧典》提出我国诗歌理论开山纲领“诗言志”说的时间,当在孔子六岁至孔子提出如上诗、乐、文系统文艺本质理论时间段之内。

**关键词:**二重证据法;“放郑声”不含郑诗;“诗言志”说产生于孔子时代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4-0100-07

自王国维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sup>①</sup>“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sup>②</sup>著名论断以来,随着地下出土文献的批量增加,“二重证据法”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其中对先秦诗乐学研究的推进同样不可忽视。本文谨以自己近年研究所得,试举两例以印证之。

## 一、二重证据法启示:孔子“放郑声”应当不包括郑国诗歌

孔子斥责的“郑声”包括不包括《诗经》中的郑国诗歌,是学术界长期争讼、迄无定论的一桩诗学公案。孔子曾数次否定“郑声”,如:“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sup>③</sup>(《论语·卫灵公》)又

如:“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sup>④</sup>(《论语·阳货》)体会孔子的原意,他针对的当是郑国音乐,认为“郑声”是有失“中正”而“乱雅乐”的“过度”之声,这里“郑声”与“雅乐”对举,当不包括郑诗。但是,因为《诗经》诗乐一体,每首诗都是配乐演唱的,有了“淫诗”内容才可配相应“淫声”,“淫声”乐调与“淫诗”内容不可能割裂开来,因此汉代以后,不少人认为孔子对“郑声”的否定就是对郑诗的否定。他对包括音乐和诗歌在内的所有“郑风”都反对。

最早将“郑声淫”含义的解释明确转指郑诗的是东汉许慎,其《五经异义》云:“郑诗二十一首,说妇人十九矣,故郑声淫也。”<sup>⑤</sup>由音乐乐调的失正指向了诗歌内容的淫乱。至两宋之交的郑樵,则将许慎之说具体化,首次指斥“郑风”中的

**收稿日期:**2014-01-12

**作者简介:**徐正英,男,河南濮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出土文献及佚文献文艺思想研究”(编号:07BZW019)、中国人民大学2012年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阶段性成果。

①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9页。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全集》第十一卷,第242页。

③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87页。

④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225页。

⑤ 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许慎之前班固《白虎通义·礼乐》已曾有类似表述,但不够明确。

《将仲子》一诗为“淫奔之诗”。<sup>①</sup> 深受郑樵影响的朱熹,进而对二十一首“郑风”诗歌逐一定性,其中有十五首被斥为“淫诗”。<sup>②</sup> 至此,孔子的“郑声淫”也就成了“郑诗淫”的同义语,“放郑声”也就被理解成了“放郑诗”或“放郑风”。<sup>③</sup> 不过,虽然朱熹之说影响深远,但认为“郑声淫”并不包括郑国诗歌、“放郑声”并不等于“放郑风”的不同声音也从未消歇,如明代杨慎、清代尤侗、姚际恒、戴震、马瑞辰、陈乔枏、方玉润、陈启源等都力辨“郑风淫”说之妄。<sup>④</sup> “五四”以后,随着传统价值判断标准的被颠覆,“郑风淫”的帽子虽然被甩掉了,但孔子“郑声淫”“放郑声”之说到底单指“郑风”中的音乐还是兼指“郑风”中的诗歌文本,这一问题本身却并未获得解决,至今仍是悬案。<sup>⑤</sup> 统观各自的理由都有道理,一方面,《诗经》中诗乐一体是事实,“郑风”多为爱情诗也是客观存在,孔子贬斥“郑声”难以撇开郑诗也就合乎情理了;另一方面,孔子既然在《论语·为政》中明确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sup>⑥</sup>,认为所有《诗经》文本的思想内容都是纯正的,就不可能再自相矛盾地单独抨击郑国的诗歌内容,同样合乎情理。并且,孔子若否定郑诗,其校订“诗三百”时为何不删除郑诗?《乐记·魏文侯》中子夏批评郑声淫志、宋声溺志、卫声烦志、齐声乔

志,若包含诗歌,则《诗经》当有“宋风”,而事实上《诗经》并没有“宋风”。在各据理由的同时,笔者感觉双方又都略偏宏观,如果能找到孔子评价郑诗具体作品的实证,问题就好解决了。而传世文献又满足不了这一条件,因此,再局限在传世文献中讨论这一问题,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

所幸,新的出土文献为帮助传世文献解决这一难题找到了突破口。《将仲子》和《褰裳》是郑风中的名篇,两诗确实又都是爱情诗,不仅被朱熹分别定性为“淫奔者之辞”“淫女语其所私者”,而且如上所引,此前郑樵为反毛序,首先就是拿《将仲子》作为“淫诗”代表开刀的。恰恰就是这两首宋儒心目中的“淫诗”代表,正巧被孔子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论及:

第十七简云:《将中(仲)》之言不可不畏也。

第二十九简云:孔子曰:《涉溱(褰裳)》其绝。<sup>⑦</sup>

由征引可见,孔子对《将仲子》一诗重在评,对《褰裳》一诗重在解。孔子评论《将仲子》的重点不是该诗的思想主旨,而是该诗女主人公对爱情所持态度。女主人公一方面钟爱仲子,很想与他幽会,另一方面又畏惧父母、诸兄责骂及人之多言,最终在“仲可怀”与“言可畏”的矛盾煎熬中放弃了幽

① 郑樵著,顾颉刚辑点:《诗辨妄》之《诗序辨·郑风》(辑自朱熹《诗序辨说》),见《续修四库全书》第5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页。

② 被朱熹《诗集传》斥为“淫诗”的十五篇篇目为《将仲子》《叔于田》《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蓼兮》《狡童》《褰裳》《东门之墀》《风雨》《子矜》《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

③ 朱熹由“郑声淫”转称“郑风淫”之后,宋代理学家几近声随影从。至明清时期继申朱说者亦不乏其人,如明代湛若水、王阳明、陈士元,清代焦竑、顾梦麟、李光地、夏炘、崔述等,都秉承“诗乐一体”观念,将郑国诗歌定性为“淫诗”,甚至主张将其删除。如,夏炘《读诗札记》云:“郑声即郑诗也,……声与诗不能分而为二也。‘郑声淫’之‘淫’即淫佚之‘淫’,非训为过也。”崔述《洙泗考信录》云:“近世举业家说《为邦》章‘郑声淫’,云‘郑之淫’在声,非以其诗也,故孔子云‘放郑声’。余按《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则是志者,诗之本也;诗者,歌之本也;歌者,声之本也。……故诗淫则声未有不淫者,不得分诗与声为二也。”认为郑声与郑诗无法分割。

④ 力辨“郑风淫”说之妄者,如杨慎《丹铅总录·订讹》、姚际恒《诗经通论·自序》、戴震《东原集》卷一《书郑风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启源《毛诗稽古篇》中的相关言论。

⑤ 当代学者仍是声诗分指和声诗一体两种观点各说各话,互难相服。如,陈子展在《诗经直解》中主张“郑声”不包括郑诗;闻一多、高亨、程俊英、余冠英等在各自的《诗经》注本或选本中,主张“诗乐一体”;钱锺书《管锥编》批驳戴震将郑声与郑诗分指的观点。

⑥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65页。

⑦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159页。

会。孔子对诗中女主人公这种处理爱情与家庭及社会舆论压力关系的谨慎做法持完全肯定赞赏的态度,认为女孩子在爱情生活中不宜过分放纵随性,而应对家庭及社会环境有所顾忌,“不可不畏”,因为被环境约束,客观上也是对女孩子的保护。这是孔子中庸思想的一贯体现。《褰裳》所写一对青年恋人的情感状况,历代解读不一,依笔者体味,两章重叠所谓“子惠我思,褰裳涉溱(洧)。子不我思,岂无他人(士)。狂童之狂也且”的口气,应当是两人闹了小别扭,小伙子赌气不再来约会,而女孩子便以再不来就转爱他人相要挟,其要挟的目的还是为了期待小伙子主动前来。倒不像朱熹所解“亦谑之之辞”<sup>①</sup>那样轻松,也不像有专家所解“责备情人变心”“富于斗争性”<sup>②</sup>那么沉重。孔子此处的“其绝”之解,无疑是今见对该诗的最早解读,按孔子的理解,似乎也认为这首诗表达的是主人公对爱情的决绝态度。作为文化巨人的孔子,去诗歌创作时代未远,且又是《诗经》的最后校定者,长期以其为教材,此解或许有他的道理,可以继续探讨。不过,笔者借此想要强调的是另一问题:不论我们今天认不认可孔子对两诗的解读与体认,由如上解读可见,孔子对《将仲子》《褰裳》两诗文本绝无任何微词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为他肯定郑诗找到了实证。孔子以儒学初创时期健康、开放、包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将青年人的爱情和爱情诗视作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任何与“淫”字之评挂钩的迹象,全不像宋儒那样狭隘与敏感。出土文献虽仅谈及了“郑风”中如上两首诗,属于个案,但以点带面,已

足以说明孔子对“郑风”其他各诗文本的基本态度。再与传世文献中孔子对“诗三百”全部文本“思无邪”总评相印证,其所谓“郑声淫”“放郑声”乃单指郑乐而不包括郑诗,应当是符合历史事实和孔子原意的。

那么如何解释诗乐一体的问题呢?笔者以为,不妨放到孔子生活的时代环境中去体会。孔子出生前八十六年的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各诸侯国兴起了外交聘问场合赋《诗》言志之风,因赋《诗》言志现场的随机性、应变性、敏捷性、断章取义性对答要求,决定了其赋诵《诗》句时无法配乐演唱,也不可能配乐演唱,朱自清所说“赋诗是合乐的,也是诗乐不分家”<sup>③</sup>不符合历史事实,除非正式聘问内容结束后举行宴会消遣时才有可能从容配乐演唱《诗经》中的完整作品。<sup>④</sup>如此,聘问之风一个最大成果就是使《诗经》中的诗乐分家。这一成为春秋时期重要政治文化生态特征的活动,延续至孔子授徒讲学时已近百二十年,《诗经》文本与所配之乐分途发展的状况应达到相当程度。孔子虽精通音乐,并有“乐正,雅颂各得其所”<sup>⑤</sup>之述,但他授徒所讲《诗经》主要讲的是诗歌文本而非诗乐同授当是无疑的,这从《论语》孔子讲话记载中即可窥见。<sup>⑥</sup>因此,孔子所说的“郑声”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诗经》“郑风”中的郑乐,因其本就已与郑诗文本分离,孔子从维礼的高度对郑乐音调失中扰乱雅乐极为反感,而这并不影响他对郑诗内容的喜欢;另一种可能是,孔子所说的“郑声”本就不是《诗经·郑风》

① 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

②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

③ 朱自清:《诗言志辨》,《朱自清全集》第六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3页。

④ 据俞志慧列表统计,《左传》所载外交赋诗活动54次,只有鲁襄公十六年(前557)晋侯在会盟宴上组织观看了歌诗舞诗活动;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公子季札聘鲁,在鲁宫廷观周乐,乐官演唱了全部《诗经》作品,其他各次都是不歌而“诵”的“赋诗”活动。见《君子儒与诗教》,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9—141页。这两处《诗经》配乐演唱之例属于外交礼仪场合而不属于外交政治谈判场合。

⑤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606页。

⑥ 《论语》中孔子讨论《诗经》中的诗乐时,一般都是分而论之的,其单独言及《诗经》文本13次,单独言及《诗经》之乐3次,其诗乐兼论仅有2次,并且是否兼论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足见当时《诗经》诗乐分离的事实。13次论《诗经》文本见《学而》《为政》《述而》《泰伯》《子罕》《子路》《季氏》《阳货》,3次论《诗经》之乐见《泰伯》《卫灵公》《阳货》,2次诗乐兼论为“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八佾》)和“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中配诗演唱的音乐,而是指另外单纯的郑国音乐,孔子看不惯郑国扰乱雅乐的流俗新乐。这一点我们可从先秦传世文献中找到一些间接证据。如孟子在《孟子·尽心下》曾对孔子的“恶郑声”解释说:“恶郑声,恐其乱乐也。”<sup>①</sup>孟子重在说明孔子担心的是“乐”而不是别的。孟子去孔子不远,对孔子时代诗乐分离状况及孔子言论的确切含义,应比后人理解得更为准确。再如,荀子在《荀子·乐论》中云:“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sup>②</sup>这段言论未必是荀子针对孔子“郑声淫”之说作解,但从“郑卫之音”与“舞韶歌武”的对举中发现,《韶》乐和《武》乐分别是虞舜时期和周武王时期的乐舞代表,都不是《诗经》中的配诗之乐,孔子曾闻听并称赞过这两种乐舞<sup>③</sup>,笔者臆测,其甚至本来可能就是没有歌辞的纯粹音乐和舞蹈?因此,荀子论述时与之对举的“郑卫之音”也有可能不是指为《诗经》中郑诗、卫诗所配之乐,而是指两国另外独立的没有歌辞的音乐和舞蹈。

总之,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双重证据印证,孔子所“放郑声”应该不包括郑国诗歌,“郑声淫”“放郑声”的诗学公案尽早定讞当成为可能。

## 二、二重证据法启示:“诗言志”说提出的时间当不会晚于孔子

现代最早研究我国著名诗歌本质特征论“诗言志”说的朱自清先生,在其名著《诗言志辨》中,

一方面称“诗言志”说是我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sup>④</sup>,客观上确认该学说的出处《尚书·尧典》是比较早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转述顾颉刚先生的考证意见,称《尧典》最早也是战国时代才有的书籍,客观上又确认“诗言志”说晚于《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前546)范文子的“(赋)诗以言志”之语。既推测“诗言志”说与“(赋)诗以言志”说“也许彼此是独立的”;又推测“‘诗言志’这句话也许从‘诗以言志’那句话来”。<sup>⑤</sup>这种摇摆不定的结论,导致了此后研究“诗言志”说早出和晚出的持续纷争。其不同观点甚至带进了全国统编教材之中。

王运熙先生主编全国统编教材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及两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将“诗言志”说放在先秦诸子之前的首章首节讨论,认为是两周之交甚至更早的产物,称:“‘诗言志’的说法却是很早就产生了的。”<sup>⑥</sup>《尧典》的写作年代,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这段话或许是春秋战国时期所写。但“诗言志”的说法,与上引《诗经》中例证所体现的观念相一致。即使这一说法正式提出较晚,也还是可以视为西周、春秋之际人们对于诗歌性质、功能的认识的一种概括性表述。”<sup>⑦</sup>其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甚至将“诗言志”说的提出时间定得早于西周,更早于“赋诗言志”。<sup>⑧</sup>而张少康先生著全国统编教材两卷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则认为,“诗言志”说

① 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31页。

② 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81页。

③ 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见程树德集释《论语集释》,第222、456、1077—1085页。

④ 朱自清:《诗言志辨》,《朱自清全集》第六卷,第130页。

⑤ 朱自清:《诗言志辨》,《朱自清全集》第六卷,第133页。

⑥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⑦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二卷本)上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⑧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第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4页云:“‘诗言志’说产生的时代,当与上述诗篇(指所引《诗经》诗篇)大致相当,或许更早。今首见于《今文尚书·尧典》,……近代学者以为《尧典》‘大概是周朝史官掇拾旧闻,组成有系统的记录,其中‘禅让’帝位的故事,在传子制度实行已久的周朝,不容有人无端发此奇想,其为远古遗留下的史实,大致可信。’(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中语——转引者注)……‘诗言志’说则应有较早的渊源。《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似已作为成语来引用,而此时孔子尚在韶龄,……故此说自属古已有之。”

是对荀子以前相关论述的总结,将其提出的时间推迟到战国末期:“‘诗言志’这种观念最早是体现在《诗经》的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的,但它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左传》记载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因为《尚书·尧典》晚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赵文子所说是指‘赋诗言志’,但它和作诗言志是可以相通的。到战国时代‘诗言志’的说法就比较普遍了。例如《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荀子·乐论》篇亦云:‘君子以钟鼓道志。’‘道志’亦即‘言志’,《尧典》所说当是对这些论述的一个总结。”<sup>①</sup>笔者以为,就传世文献所反映的情况而言,张少康先生统编教材称《诗经》时代已有“诗言志”观念当符合历史实际,诗中所表作诗目的之句可为明证,所谓“夫也不良,歌以讯之”“家父作诵,以究王讟”“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君子作歌,维以告哀”“王欲玉女,是用大谏”<sup>②</sup>等等即是。依例句不难发现,《诗经》中的“诗言志”观念是指“作诗言志”。该教材所作先有“(赋)诗以言志”说后有“诗言志”说的推论,也符合情理。因为孔子出生前八十六年兴起的那场风靡各诸侯国的外交聘问赋诗言志活动,到孔子六岁时的鲁襄公二十七年已持续九十多年,并且发展到鲁襄公、鲁昭公时代臻于全盛<sup>③</sup>,赵文子提出“赋诗言志”之说则是对这一长期活动实践的自然概括。“赋诗言志”与此前的“作诗言志”,虽然精神实质可以相通,但毕竟各不相同,“作诗言志”是作诗者言作者个人之志,“赋诗言志”则是赋诗者言所代出使国的国家公共意志。而“诗言志”说则又必是对“作诗言志”

和“赋诗言志”双重内涵的容纳与概括,所以,依生活常理,这一学说必当在“作诗言志”和“赋诗言志”观念及实践活动充分发展并提出说法的基础上,才可正式提炼总结出来,不太可能先于前两种说法而预生,也不太可能存在朱自清先生推测的“彼此是独立”的或然性。据此,笔者信从张少康先生本统编教材为“诗言志”说生成时间所设上限。既然“赋诗言志”说产生于鲁襄公二十七年,“诗言志”说生成的时间上限就当在这一年之后。王运熙先生本统编教材将“诗言志”说视为“西周、春秋之际”人们对诗歌本质认识的概括性表述的上限设定可能有些早了。

但是,笔者以为,“诗言志”学说生成时间的下限当不会晚于孔子,更不会晚在荀子之后。就传世文献而言,虽然《尧典》的生成时间存在诸多争议,然而我们应该清楚的是,《尚书》的最后编成定型年代,并不等于就是书中各篇的写成年代(因原为单篇流传),而各篇的写成年代也并不等于就是篇中所保存的史料生成年代(后人可依原有史料编写)。既然早期先秦典籍《左传》《国语》《墨子》等都普遍征引过该书内容并称“《书》曰”等,且其中《左传》引文直言“《书》曰”9见、“《某书》曰”24见、“篇名曰”5见,《国语》引文直言“《书》曰”3见、“《某书》曰”4见、“篇名曰”3见,<sup>④</sup>其所引内容之篇写成时间就不会晚于战国中期。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论语》不仅明言孔子用《尚书》作教材,“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而且孔子本人也曾数次引用《尚书》原文,如“《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为政》),“《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宪问》),说明《尚书》核心篇子的生成时

① 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二卷本)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页;又见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② 依次见《诗经》之《陈风·墓门》《小雅·节南山》《小雅·何人斯》《小雅·四月》《大雅·民劳》。另外还有《魏风·葛屨》“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小雅·四牡》“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小雅·正月》“维号斯言,有论有脊”,《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车辇》“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小雅·白华》“啸歌伤怀,念彼硕人”,《大雅·板》“犹之未远,是用大谏”,《大雅·桑柔》“虽曰匪予,既作尔歌”,《大雅·崧高》“吉甫作诵,……以赠仲伯”,《大雅·烝民》“吉甫作诵,……以慰其心”等。

③ 关于春秋赋诗言志活动的产生、发展、鼎盛、消歇历史过程,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有各类详细表格统计和系统分析,见该书第50—61页。

④ 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41页。

间不可能晚于孔子。王充、康有为、郭沫若、刘起釭等人甚至认为《尚书》就是孔子为给学生作教材而亲自编定的。<sup>①</sup>而《尧典》篇又是《尚书》的首篇,乃核心中的核心,其写成时间自然也不会晚于孔子,并且早在《左传》文公十八年(前609)所引《虞(夏)书》的内容就是今见“诗言志”说所在的《尧典》篇。如上传世文献说明,《尧典》篇无论如何不可能迟至荀子以后才写成。

可喜的是,出土文献为笔者的如上推断提供了有力的实证。上博简《孔子诗论》第一简云:

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sup>②</sup>

其实,孔子所谓“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这三句话,就是“诗言志”“乐抒情”“文表意”的另类表述。如前所论,与从“作诗言志”到“赋诗言志”、再到“诗言志”的生成原理一样,依照常理,任何一种学说的形成,都是由开始的零碎、散乱、孤立逐渐趋向系统、完备的。譬如,孔子著名的“兴、观、群、怨”说,是对诗歌文艺功能的系统归纳与总结,很明显,这一完备的诗歌功能理论,实际上就是对此前《诗经》《国语》《左传》等相关文献中美刺、观志、观风等散乱言论及观点<sup>③</sup>的总结概括和系统化。依此类推,善于总结、述而不作的孔子,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对诗歌、音乐、散文各类文学艺术本质特征所作如上全面揭示,也定当是在前人分类零散孤立揭示诗、乐、文特征言论基础之上汇总提炼的结果,其中《尚书·尧典》“诗言志”说应当就是被吸收的观点之一。换言之,孤立的“诗亡隐志(诗言志)”说必产生于系统的“诗亡隐志(诗言志),乐亡隐情(乐抒情),文亡

隐意(文表意)”说之前,而不会倒过来。因此,《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说也就必生成于“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说之前并且被吸收,而不会倒过来。

总之,通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相互印证,笔者对著名的文学本质论“诗言志”说的生成时段做出如下确认:出土文献中孔子揭示诗歌本质特征的言论“诗亡隐志”说是对其时同义语传世文献《尚书·尧典》中“诗言志”说的借用,并与揭示音乐本质特征的言论“乐亡隐情”说、揭示散文本质特征的言论“文亡隐意”说融合为一体,成为当时最为系统全面的文学艺术本质特征理论。从“作诗言志”“赋诗言志”<sup>④</sup>,到“诗言志”,再到“诗亡隐志(诗言志),乐亡隐情(乐抒情),文亡隐意(文表意)”,当是先秦诗歌本质理论一个自然的生成演进发展过程。因此,《尚书·尧典》“诗言志”说的生成时间,虽不会早在西周之末,但也不会晚于春秋末年的孔子,更不会晚在战国末期。具体提出时间应该在孔子六岁时“赋诗言志”说提出之后至孔子提出“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说之前的一段时间之内。至于统编教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所言“诗言志”说是对《庄子》《荀子》相关言论的总结,其实《庄子·天下》篇的“诗以道志”和《荀子·儒效》篇的“《诗》言是其志也”皆并非孤立零散之语,各有自己完备的话语体系。其全文分别为:“《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sup>⑤</sup>“《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

① 王充《论衡》“须颂”,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47页;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8页;刘起釭:《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81页。

②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第123页。

③ “美刺”观念见前注所引《诗经》表白写诗目的之句。“观志”观念,如《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厉王弭谤一段著名言论,让“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孔子六岁时赵孟请郑国七子赋诗“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左传·昭公十六年》孔子二十六岁时韩宣子让郑国六卿赋诗“起亦以知郑志”。“观风”观念,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八岁时,吴公子季札至鲁观周乐时的评论等。

④ 其实据《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厉王弭谤”一段文字可知,在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活动之前,西周晚期还曾经有过“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以进谏的活动,该进谏活动无疑蕴含有“献诗言志”之意,但召公的表述未提升到如“(赋)诗以言志”这样的理论概括层面,加之该活动讨论已多,故本文从略。

⑤ 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8页。

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sup>①</sup>是系统揭示“六经”或“五经”的功能特征,与诗歌本质论并非同一话题,“诗言志”说也不可能以零星之说产生于系统评论之后,更不会以一体总结众书众体。至于《荀子·乐论》“君子以钟鼓道志”之言,则是

一篇音乐专论,与讨论诗歌本质特征也不是同一个话题。所以,笔者以为,统编教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为“诗言志”说提出时间所设下限可能有些晚了。

## Some Notes on the Double-Evidence Method and the Study of Poetics in the Pre-Qin Dynasties

Xu Zhengy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bamboo slips entitled *Confucius on the Book of Songs* (《孔子诗论》), which are kept by Shanghai Museum, record Confucius' appreciation of *Qiangzhongzi* (《将仲子》) and *Qianshang* (《褰裳》) in *Zheng Songs* (郑风), which were classified as “obscene poems” by Confucians in the Song Dynasty. Confucius affirmed *Qiangzhongzi* by saying “One cannot fear nothing” (不可不畏), and affirmed *Qianshang* by saying “They have gone to extremes” (其绝). This confirms Confucius' positive evaluation of all the poems from *the Book of Songs* (《诗经》) by saying that they are all “pure thought” (思无邪) in *the Analects* (《论语》) which has been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nd this also indicates that Confucius' negation of Zheng-music (郑声) does not mean the negation of the poems from the Zheng State (郑国). In *Confucius on the Book of Songs*, he put forward his systematic theory about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Confucius stated that a poem expresses one's will (诗言志), music expresses one's feelings (乐抒情), and writing expresses one's ideas (文表意). These statements ar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view of “writing a poem to express one's will (作诗言志)” 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with the concept of “composing a poem to express one's will (赋诗以言志)” in *Zuozhuan* (《左传》). *Yao Dian in the Book of History* (《尚书·尧典》) suggested that the view of “writing a poem to express one's will”, which was the originative outline of Chinese poetics, was initiated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time when Confucius was six-years-old and the time when he put forward his systematic theory about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Key words:** double-evidence method, The negation of Zheng-music does not mean the negation of the poems from the Zheng State, The statement that a poem expresses one's will appeared in Confucius' times

(责任编辑 郑园)

①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133页。